

# 反對派「退黨潮」勢所必然

孟東



在特首梁振英公開招聘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之際，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和公民黨創黨成員蔡海偉也報名應徵公職。但兩人競聘之事在被媒體披露後，不得不被迫退黨。退黨原因，被兩政黨解釋為所謂的加入政府與政黨黨紀相違背，更被批評為「賣黨求榮」。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 「大佬」掌控 淪「永遠反對黨」

候任特首梁振英為在7月1日上任後提升管治力，着力解決香港存在的一些深層次亟需解決的問題，特提出「大和解」的理念。一是為彌補因激烈競選對各種政治勢力的傷害，希望將各種勢力團結起來、重整上陣。二是希望將各種優秀人才吸納進入新政府，不論是「唐營」中的各種優秀人才，還是反對派中可以接受和妥協的溫和派，都可以進入新政府為民服務。為此，候任政府成立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遴選委員會，以期公平、公開和公正的選聘各類政治人才，誠邀加入政府問責團隊。作為一名政黨成員，無論是建制派政黨還是反對派政黨，加入政府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行為。首先

，香港基本法第33條賦予港人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這是憲制上的神聖權利，加入政府進入管治團隊並不存在違法行為。其次，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職位沒有排斥政黨成員，更何況香港的特首選舉條例也允許政黨成員競選特首。只要具備基本的資格要求，並通過遴選委員會的考察，便可成為問責團隊成員。政府非常歡迎有志之士加入政府。然而，馮蔡兩人卻在加入政府行為被披露後被迫退黨，根源在於兩黨長期以來的「為反對而反對」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加以修繕。

從歷史上看，民主黨自成立以來就走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對立面，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永遠反對」的政黨，意識形態長期被幾個保守傳統、不懂發展的「大佬」掌握着，缺乏理性發展思維，只懂的一味「為反對而反對」。相比而言，公民黨比民主黨走得更遠一些，可算是香港政治勢力中的激進力量。長期以來，公民黨和民主黨在港人心中樹立了一種「反對性形象」，該黨成員在未告知的情況下私下加入政府，明顯是打了兩黨一巴掌，同時也暴露出其政黨內部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

像民主黨這種反對派第一大黨有近20年的黨史了，可是由於長期與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作對，政治發展空間狹小，除了能夠參與每四年一次的立

法會選舉之外，幾乎沒有其他途徑加入政府實現政黨理念。況且，民主黨其實並不民主，其黨內的政治民主生活充斥着「大佬」文化，政黨的政治主張和地區競選名單也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黨內第二、三梯隊根本沒有上位空間，政治前景一片黑暗、毫無可能性可言。在長期上位無望的情勢下，黨員加入政府也是無可厚非的。

## 雙重標準 亂扣「賣黨」罪名

不得不承認，政黨和黨員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考慮，政黨有着自己的理念和政綱，有志黨員也要為日後發展前途考慮，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民主黨和公民黨卻在使用雙重標準，歧視性地對待本黨成員。為什麼公民黨梁家傑可以參與2007年的第三屆特首競選，民主黨的何俊仁也可以參加2012年的第四屆特首競選，民主黨選就改政與中央政府合作推動香港發展進步，反而馮煒光和蔡海偉這次加入政府問責團隊卻要冠以「賣黨求榮」的罪名，還迫使使其退黨。如果都要以這標準懲罰加入政府的黨員，那麼梁家傑和何俊仁早就該被割除黨籍了，所以這明顯暴露了他們的獨裁專權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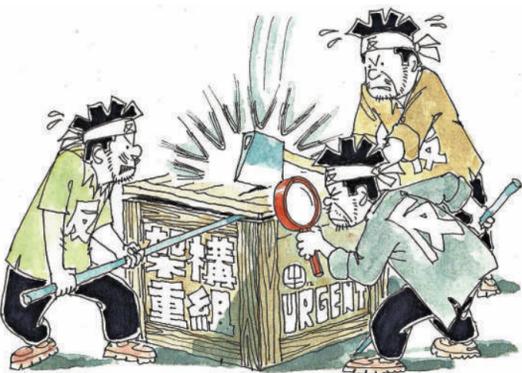
正因為民主黨內部這種專橫行為，才導致近年

來出現多次退黨事件。張炳良就因政見不同而被迫退黨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無論是加入政府還是參與立法會議員選舉，都是抱着一個服務香港的心，整合民意，為民請命。作為地區區議員的馮煒光同時兼具民主黨中常委，為港島市民服務多年，在以往立法會選舉以至今年的立法會選舉都沒有資格，更沒有納入政黨長期培養對象。如今想加入政府更好地服務港人，卻被加以批判和割除黨籍，這樣的政黨又何談會有什麼政治前景呢？

## 眾叛親離 政治前景堪憂

為重塑造黨的「反對派形象」，民主黨和公民黨無情地把馮煒光和蔡海偉剔除黨外，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黨。同時為了轉移責任，又批判政府不應將求官者曝光，這更是不值得一駁。

馮煒光和蔡海偉申請公職被迫退黨事件，充分暴露出民主黨和公民黨「為反對而反對」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同時還使用雙重的政治標準對待其黨成員，必對政黨第二梯隊造成影響，長此以往，日後退黨事件必然層出不窮，其政治前景令人擔憂。香港面臨着2017年特首普選和2020年立法會普選的政治變革，只有有勢力、有前途的政黨才能把握機會，民主黨曾與中央政府合作，本是一個理性溫和的政黨，不應該和公民黨等激進勢力同流合污。無論是做區議員還是加入政府，都是秉持着一個服務香港的心態，有胸襟、有魄力、有視野的政黨是要培養人才，更好地服務港人，而不是只顧及其的狹隘小利益，把加入政府說成「賣黨求榮」。



吹毛求疵

黃牛

# 飲水思源 貢獻國家

梁立人

香港之所以能在驚濤駭浪中成為「不死鳥」，完全是受益於「一國兩制」，「一國」和「兩制」加起來，形成了香港獨特的競爭優勢。香港人要飲水思源，和十三億人同心同德追求國家的進步。井水犯河水的做法最後只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結果只會損害七百萬香港人的利益。



候任特首梁振英直言，香港近年來的經濟增長太慢了，相信他說的話是相對新加坡而言。事實上，新加坡近年來的經濟增長高達10%，而香港經濟在今年第一季進一步放緩，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繼續增長0.4%，較去年第四季的增長3%，顯著收窄。不過，特區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的管治能力是無法相比的，前者受制於反對派的強力對抗，施政受到嚴重干擾，舉步維艱，寸尺難進；後者一黨獨大，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兩者相較，可說是「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 打破詛咒 穩中上進

毋庸諱言，回歸十五年來，香港可說是風雨兼程，路途坎坷，由於政治紛爭激烈，一小部分人利用「一國兩制」作為他們的反共屏障，展開了激烈的對抗，令社會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加上禽流感、沙士等疫症侵襲，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的衝擊。難有一天是平靜的。不過，儘管如此，香港的經濟仍能在穩中上進，回歸以來，香港的GDP年均值可保持百分之三以上的增長，是世界第十五大銀行中心；外匯儲備高達兩萬五千多億，外匯交易市場保持在世界前五名之內。這一事實，打破了西方學者關於回歸後將出現「香港之死」的預言。

香港之所以能在驚濤駭浪中成為不死鳥，完全是受益於「一國兩制」，「一國」和「兩

制」加起來，形成了香港獨特的競爭優勢，令香港同時扮演了「中國通往世界的窗口」和「世界進入中國的門戶」的雙重角色。

香港毗連內地，位處全國最具經濟活力的珠三角經濟圈內，既有天時又有地利，由於「一國兩制」的關係，香港既屬中國的一部分，同時又保留了資本主義的特色，故內地人來到香港，既有回家的感覺，也有外遊的感受；外國人來到香港，既有在外國的方便，也能體會到中國的特色。一個只有七百萬人的城市，能同時得到中國十三億人的關愛及全世界人的注目，可說是得天獨厚，有如一箇靠近萬頃大湖的小水塘，是不愁缺水的。

## 受惠「一國」 屹立不倒

說句良心話，香港經濟之所以能屹立不倒，完全是受惠於「一國」框架下的保護。在「十二五」規劃中，國家特別增寫了港澳專章，「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空、物流、旅遊、專業服務、資訊及其他高增值服務業，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高價值貨物存貨管理及區域分銷中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空中心的地位，增強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就憑着中國的背書，香港才能取得投資者的信心，成為知名的世界金融中心，集資能力長期保持在世界前列；曾幾何時，由於香港製造業流失，形成職業錯配，失業率大幅提升，國家為香港提供了「個人遊」和CEPA的方便；瞬間解決了香港的問題，光是個人遊，每年為香港帶來過千萬的遊客及以億計的生意額，令旅遊業成為香港經濟的新支柱，也給香港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去年李克強副總理訪港，也帶來了三十六項支持香港發展的優惠政策等等。

如香港未有回歸祖國，香港是不可能享受到這些政策支持的。

由此可見，香港雖然沒有一個強勢的政府，卻有一個強大的靠山，從長遠來說，只要特區政府能處理好深層次矛盾，香港仍然有比新加坡更大的優勢。

## 擺脫糾纏 續創繁榮

首先，香港歷年來累積了龐大的財富，香港不但沒有負債，更有六千六百多億財政儲備和兩萬五千多億外匯基金資產，是世界上財政狀況最良好的地區之一。現在整個世界都受美國經濟倒退和歐債危機的衝擊，多個國家面臨破產的威脅，相形之下，香港政府財政有大量盈餘，錢多到要還富於民，令不少國家感到又羨慕又妒忌，這已是為政府管治打下良好的基礎；在土地資源方面，香港只發展了約三成土地，仍有近七成的土地尚待開發。只要下一屆政府能擺脫反對派的糾纏，好好規劃，必然可以打破以前的窠臼，讓香港提升一個新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要飲水思源，和十三億人同心同德的追求國家的進步。「一國兩制」給香港自由發展的空間，但並不意味着「一國兩制」鼓勵香港人用西方民主去挑戰中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井水犯河水的做法最後只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結果只會損害七百萬香港人的利益。

對新一屆政府而言，我們並不需要像新加坡政府那樣至高無上的權威，更需要的是對國家的忠誠和熱愛，因為，香港繁榮所賴並非單純是制度的優越而是國家的支持，前特首董建華先生說過，「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這絕不是一時即興的貪口爽，而是平凡中見智慧警句。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 馮煒光們「賣黨求榮」說明什麼？

近日，城中最熱門的話題是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公民黨創黨成員蔡海偉等資深成員公然「賣黨求榮」，應徵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職位。我們如何看待這一社會生活中突現的政治問題，其潛在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 一、民主黨、公民黨及社民連「大佬文化」成災，二、三梯隊沒有政治出路。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在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中，從政的人士所追求者，一為意識形態，即所謂的「理想」和「主義」；二為實際利益，如官位、高薪厚祿、政治榮譽等。一般來說，雖然不同的人對兩者各有側重，但是，完全放棄實際利益的從政人士可以說是少之又少。在香港這樣一個生存壓力巨大的地方，要讓從政的人士不顧實際利益而去完全追求所謂的「理想」和「主義」，無異為天方夜譚。

在香港的所有政黨和政治組織中，民主黨、公民黨及社民連是「大佬文化」最盛行、最嚴重的。數十年來，這三個政黨內的主要領導位置、立法會議員的位置都為黨內大佬把持，黨內的二、三梯隊中除了個別大佬的心腹（如陳淑莊）能夠出頭外，絕大多數人辛苦耕耘數十年，熬到四十多歲甚至五十多歲還默默無聞，不但政治上毫無前途可言，而且在經濟上也一點都不富裕。在這樣的政黨內呆久了，有能力、有抱負的二、三梯隊人士心存異志是十分正常的，抱持愚忠理念的人反而是不正常的。

本來，在特區政府架構裡，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並不是什麼顯赫的位子，但是，卻引來不少反對派陣營的中堅分子不顧叛黨的罪名前來應徵，如果不是留在黨內毫無前途和希望，他們能這麼幹嗎？

## 二、逢政府必反的政策迫使二、三梯隊叛黨。

在這次反對派陣營爆發的「賣黨求榮」潮中，叛黨出走最惹眼的，除民主黨和公民黨外，「應徵」人數最多的，不是別人卻是反對政府最力的社民連成員，這是否真有諷刺意味？

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對以政治或行政為職業的人來講，政府無疑是掌握政治資源和職位最多的部門。然而，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長期頑固堅持「逢政府必反」的政策，更禁止黨員加入政府。在這次馮煒光出走事件中，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公開聲稱，民主黨不容許任何黨員加入問責團隊或行政會議，馮煒光此舉已違背了該黨的決定和方針。民主黨議員李永達則指責馮煒光「賣黨求榮」，要彈劾馮煒光，並要求懲處馮煒光。如上所述，民主黨、公民黨及社民連由於「大佬文化」盛行，黨內的二、三梯隊既進不了黨的領導層，更成不了立法會議員，而黨又不讓他們到政府內謀職。這實際上就是黨內高層只顧自己而不顧他們死活，這樣的黨不叛，實在是沒道理。

## 三、梁振英是一位值得從政人士追隨的政治人物。

一是香港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的政治主張給香港帶來了新的希望。特別是梁振英提出的「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施政理念，重視土地及房屋政策、拓展香港的經濟版圖、改善民生、提高管治水平的施政重點既宏觀又具體，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既正面回應了普羅大眾最迫切的訴求，又能保障工商業資本的合理利益，確實是切實可行的。

二是梁振英作風硬硬、穩健、有氣魄，是香港不可多得的政治人物。而反對派的一眾頭面人物要麼陰險怪異，要麼形容猥瑣，要麼粗鄙不堪。兩相比較，現在在這樣講究個人形象的時代，梁振英無疑更值得追隨。

三是梁振英堅持任人唯才，對反對派中有能力、有抱負的精英人士也很有吸引力。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 中國在G20主力作用顯現

陳群



G20第七次峰會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落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峰會，會見了多國領導人並發出當今全球經濟最強音。他向世界介紹了中國經濟穩定發展態勢，提出了中方對當今全球發展的建議，號召G20「攜手應對世界經濟緊迫問題」。《紐約郵報》指出，「G20花了特別多的時間討論全球經濟狀況，特別是歐元區形勢」。而中國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着高速發展，令與會歐洲各國十分羨慕。因此，「各國都希望中國能夠在刺激經濟增長中發揮主力作用。」

## 中國貢獻實實在在

胡錦濤在峰會上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在外部經濟環境複雜嚴峻的大背景下，中國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構建擴大內需长效机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今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1%，經常帳戶盈餘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已降至1.4%。為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還指出，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我們有信心繼續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

快發展，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筆者以為，當今世界人民最關心的還是國計民生，因為這關乎幾十億人的生存質量。那種以冷戰思維處事的種種舉動，不合民心，不符民意，不能令民眾有尊嚴地生存。G20當中的西方發達國家，應虛心聽取中方意見，不可再延着沒有希望的老路混下去了。

## 應攜手而非掣肘

此次峰會是在世界經濟面臨諸多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二十國集團在國際經濟事務中作用更受重視背景下舉行的。中方期待峰會繼續致力於保增長、促穩定，向世界經濟傳遞信心，向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動力。中方希望各國做好五方面工作：第一，體現二十國集團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夥伴精神。第二，攜手應對世界經濟領域重大和緊迫問題。第三，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第四，促進國際貿易健康穩定發展。第五，繼續把發展問題作為二十國集團常設議題。中方希望峰會能釋放G20重視發展問題、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的積極信號。

筆者以為，儘管美國「入亞」、南海紛爭、中東告急等世界性動盪因素不斷增長，但西方持續不景氣與金磚國家仍保持良好發展的大趨勢沒有質的變化，中國仍是世界經濟的穩定器。中方的立場是無論東西與南北發展問題，也無論是發達與發展中國家，所有國家都應攜起手來共同發展，而不是瞪起眼睛相互掣肘。這對於當今全球擺脫經濟困境，復蘇世界經濟，推動全球發展，都是第一要義。正如胡錦濤指出的，「二十國集團包括了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構成相對均衡、代表性較強，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和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在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下，各成員應該本着同舟共濟、互利共贏的精神，共同致力於保增長、促穩定，鞏固並增強來之不易的經濟復蘇勢頭。」

## 擴大中國發言權

2008年11月，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G20首次峰會在華盛頓舉行。此後，在倫敦、匹茲堡、多倫多、首爾、康城舉行了二至六次峰會，主題一直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復蘇等問題。胡錦濤出席了歷次峰會，每次都提出了中國意見主張，受到與會領導人高度重視。但也必須承認，中國在世界上的發言權與所做的貢獻仍不平衡。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坦率指出，「中國所承擔的責任跟中方在全球經濟治理和決策過程中的發言權並不相稱。」「權利和義務是平等的，我們做出了這麼大的貢獻，但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份額並沒有完全反映我們現在的經濟實力和所做的貢獻。」

筆者以為，在國際事務中權利與義務都應是對等的，這也應成為G20的基本原則。但很遺憾，當今世界仍未擺脫核武話語、霸權政治、叢林規則、強人當道這一套冷戰思維模式。在國際大家庭中，中國一直扮演著「多擔責任，多盡義務」卻較少享有「擴大權利，擴大份額」的老好人角色，這是極不公平的。多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第一引擎，一直為包括周邊諸國的所有國家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換來的卻常常是「農夫和蛇」的故事，南海「諸蛇吞象」即最新篇章。馬克思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們是不是也該琢磨一下了？作者為資深評論員